

打印 收藏



# 塑造身份认同与巩固战略基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演进

发表于 《国际问题研究》 2010年第1期

[中国对外战略](#) [发展中国家](#) [国际体系](#) [战略基础](#)

## 简介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有着复杂的经验和丰富的成果，既经受了意识形态和国家身份认同的矛盾，也为维护国家的战略自主地位做了艰苦的努力。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国力迅速提升为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平台，在此之上，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认同仍然是判断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出发点，因而推动与巩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继续成为中国的战略选择，包括与新兴大国、周边国家及非洲拉美等重要资源国的关系。

## 正文

发展中国家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最大群体，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础。[1]“基础”一说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国际体系的一种认识，即国际体系存在着一种隐性的结构，中国通过与这个最大群体构筑合作关系打造中国外交政策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可以推进其战略目标的实现。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目标而言，正确认识中国自身的身份认同与发展中国家在体系中整体地位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战略自主的民族国家，必然要努力提高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实现民族复兴，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前景又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地位联系在一起。本文拟从当代国际体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论述新中国对外战略中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这个方面，并试图从中找出有助于理解未来发展趋势的结论。

### 一、意识形态之争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

意识形态之争是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标志。在这个标志下，几乎

所有国家都有被归类的经验，这种归类，自愿或非自愿，代表了雅尔塔体系的成型。新中国成立与国际体系这个进程几乎是同步的，新中国成立后所做的选择则既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系对中国在政策和战略的选择上所施加的制约的体现。中国的“一边倒”选择是在新中国审时度势后做出的，这个选择一方面扩展了中国在冷战逐渐走向高潮时在国际体系中运作的战略空间，使西方大国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的企图完全不可实现；另一方面，这个选择也限制了中国实现完全战略自主的可能，成为苏联领导阵营的一个成员，尽管中国当时在苏联阵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其他相对弱小的成员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但毕竟仍然是苏联领导下的一个成员。这一点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新中国的战略选择对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影响，总体来看，不算是很积极的。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努力拉近其与发展中国家的距离，并且客观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冷战初期大都仍需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但社会主义阵营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仍然是有限的。在亚洲，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企图寻找两大集团之间的“中间道路”，以尼赫鲁的泛亚洲主义精神为号召，以至于尼赫鲁甚至在1955年召

## 作者信息



赵干城  
研究员  
国际战略研究所 成员  
亚太研究中心 主任

## 作者更多研究

[论文](#) | [时评](#) | [专著](#) | [研究报告](#)[亚太地区“再平衡”新格局与发展前景](#)[传统与现实中的“全球性大国”之梦——对印度强国战略的分析解读](#)[印度洋：中国海洋战略再定义的动因](#)

## 相同话题研究

[论文](#) | [时评](#) | [专著](#) | [研究报告](#)[“亚信上海峰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与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联合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

## 相同地区研究

[论文](#) | [时评](#) | [专著](#) | [研究报告](#)[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国家安全治理](#)[亚信：促进亚洲安全与合作的重要平台](#)[构建亚洲相互信任体系和新型安全观](#)

开的亚非国家万隆会议上公开号召发展中国家既不要参加美国拼凑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也应该退出苏联控制的“共产党情报局”。尼赫鲁的这种说法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影响的，其思想后来也发展成在两极格局之下寻求“第三条道路”的先声，印度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国际形势的这种发展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中国当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刚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一样，也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因此在中国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中国完全应该将自己列入发展中国家的同一个阵营，但这却不是现实。现实是在意识形态争端阴影下，中国的这个“站队”还有是否被认同的问题。万隆会议之成为中国在冷战初期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标杆，其原因也在于此，因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目标在这次会议上得到出色的阐述，周恩来在会议上大力呼吁的“求同存异”精神为解决身份认同与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恩来个人的杰出外交活动在这次重要会议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既使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认同，也使“求同存异”成为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原则，为中国与大批发展中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铺平了道路。

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身份认同上是同一阵营的，但国家与国家之间因利益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与争端也同样存在。当这种分歧与争端导致危机产生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有时令中国处于比较被动甚至不利的地位，例如中印边界冲突后，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一定的不利于中国的变化；越南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部分亚洲反共国家的目标。在冷战环境下，意识形态之争在亚洲常常明显地或隐性地纠缠于相关的矛盾之中。中国为团结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包括在中国自己也相当困难的时候，就向中国的邻国及非洲国家提供各种援助，目的在于向全世界昭示，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并不就是意识形态的同一性。中国领导人通过对亚非国家的访问，彰显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意愿，这为后来中国与苏联决裂后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此外，冷战初期西方国家在铁幕理论指导下掀起的反共浪潮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政策造成压力，虽然这主要是针对苏联的，但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对华政策中也有所体现。美国在亚洲建立的对华包围圈有很大一部分成员也是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均是这种情况，这使中国在这段时期的外交工作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努力“求同存异”方针，本来就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面对美国领导的反共大合唱，中国既需要坚持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立场，也要推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这是中国在冷战初期在外交战略上始终面临的一个挑战。评估中国在“一边倒”时期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时，一个总的看法是，在国际体系的制约力量下，中国为谋求战略自主地位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检测中国是否获得战略自主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中国与印度等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明确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方针，通过万隆会议，中国在与苏联集团决裂前，已经基本完成了身份认同和战略自主地位的塑造，为接下来一个阶段打开困难局面创造了条件。

## 二、中美苏“三足鼎立”与“三个世界”理论

与苏联决裂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为重大的举措之一。中国在寻求

完全独立地位的进程中改变了世界格局，构成了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量。尽管中国当时的国力以及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远远谈不上所谓“一极”的地位，但由于中国脱离苏联集团，以及美国在1960年代后期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急于寻求变局，这使中国有可能在两极体系之外形成另一个基点，中美苏“三足鼎立”由此产生。在这个基本格局中，中国的独立地位得到尊重，并因此为中国在两极格局下谋求新的战略空间提出了新的可能，中美关系破解是直接体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因而获得了与冷战初期完全不同的地位，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是中国于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抬进去的。这显示了中国在与苏联决裂后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恢复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和解，促使中国重新认识国际体系。尽管此阶段意识形态在中国内外战略中都仍然具有重要地位，但与冷战初期相比则已有质的不同，而在身份认同上，中国更提出了具有前瞻意义的看法，那就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根据某些西方学者的看法，“三个世界”的理论，实际上是先有“第三世界”这个说法的，而这又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社会存在的“第三等级”。[2]无论这种说法是否有充足的根据，也无论毛泽东当年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时是否了解这个背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第三世界”之上的所谓“第一”和“第二”世界确实是雅尔塔体系所确定的那个治理世界的模式。换言之，“三个世界”理论用一种非常容易理解的方式解释了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态，因而在国际政治理论上是一个贡献。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认同因“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而清晰化。中国归属于“第三世界”，这以中国的实力而言，当然没有需要讨论的地方，而且因这个地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推行的政策将不再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区别，中国奉行的和平独立外交政策在脱离苏联集团归入“第三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成形。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世界”理论虽然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中国所处的“第三世界”却基本是按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而定的，也就是“第三世界”是与贫困落后联系在一起的，与“第三世界”成员奉行何种意识形态或社会政治制度关系不大，这使得“第三世界”事实上是一个十分庞杂的集团，成员的社会形态差异极大，在国际社会中的立场主张常常也没有什么共同点。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时期的关系在冷战初期已经建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以反对霸权主义为基本原则，强调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国际体系之下所处的不平等地位，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变不平等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要求。与此同时，由于这个时期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

国家的关系逐渐正常化，中国的国际地位因而有了显著的改变，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并先后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关系正常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所坚持的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有所弱化，中国进一步强调与发展中国家同心同德，这与中国当时国内仍然十分坚持的意识形态没有很大关系。事实上中国与西方及日本等发达国家重建正常关系的过程就是中国逐渐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身份认同在“三个世界”的理论框架中没有什么困难，中国理所当然成为“第三世界”的一个成员，因而也逐渐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正常成员。

其次，中国的反霸斗争使中国对外政策的独立性十分突出，这一般而言，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长期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低下，虽然有不结盟运动及其他反对两极格局的机制，但在体系力量的制约下作用有限。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以反对霸权主义为号召，形成了政治上的另一种感召力，尽管中国奉行的意识形态，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看，与苏联并无大的区别，中国与苏联的决裂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争吵的结果，但中国坚决反对苏联的政策和立场使中国在国际体系的范畴内与苏联根本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格局，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苏联一向有疑虑的国家，如东南亚国家等，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

再者，中国与美国的和解虽然主要是出于大国关系调整的需要而进行的，但在和解的进程中，中国既没有成为美国的附庸，也没有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上，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都没有因与美国的关系而发生重大的变化，应当说，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了一个真正的飞跃，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契机，邓小平出席1974年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阐明了中国在“三个世界”框架结构中的地位，即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中国永不称霸，这为中国改革开放后调整对发展中国家战略指明了方向：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认同是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国际格局发生何种变动，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全力推行的和平独立外交政策必然也是将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视为最主要的方针之一。

### 三、改革开放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战略

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政策调整。改革开放的主要

动因当然是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与要求，但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同样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包括中国的发展模式，这虽然主要是针对经济发展问题的，但在政治上产生的影响甚至可能更深远，例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可能不复存在，这个论断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同样重要。

继中美苏“三足鼎立”在战略上的意义逐渐降低后，中国的实际地位问题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30年的内外动荡，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十分迟缓，中国的实际国力在剥去一些不适当的光环后显示出真实的一面，中国的封闭所造成的落后使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处于非常虚弱的状况，尽管中国已经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核武器国家。这种状况因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而实现了根本的改变。从1980年代初到冷战结束的十多年里，中国领先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内外两个大局中，中国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根本上摒弃了随时准备与外部世界发生冲突的观念，并全力以赴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因此当冷战正式宣告结束之际，中国实际早已进入了新的轨道，即融入当今世界体系，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为中国国力的全面提升奠定了物质和理念基础。在这个大背景下讨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几个需要高度关注的方面。

在政治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没有因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发生质的变化，这里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认同并没有因改革开放而改变，中国在谋求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中仍然坚定地认为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这在冷战尚未结束的1980年代特别明显：中国虽然与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都相继正常化，但中国奉行的和平独立外交政策仍然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平台的，尽管与超级大国斗争的一面有所弱化。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单极化趋势突出，在自由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喧嚣声中，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地位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体系中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并且事实上诸多发展中国家也陷入各种内外动乱中。在国际格局的大变动中，中国努力寻求自身的定位，同时加强落实睦邻友好的周边政策，应当说这一时期中国与传统的非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关系有所淡化，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则有着快速的发展。

在经济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展开的，在对外战略方面，中国对经济的高度重视反映在这个时期，发达国家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大幅度上升，因为发达国家既是中国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的来源，也是中国发展外贸的主要市场，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显然是下降了。尽管如此，中国并没有改变在经济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个传统政策，而且随着中国经济能力的加强，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方面，中国的力度更有所增加，除了传统的政府援建项目和派遣医疗队等，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根据中国的优势，特别注重技术和专业培训方面的援助，意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共同发展的道路。因此，从经济上看，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发达国家，但长远而言，由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历史经验和相似的国际地位之基础上的，因此中国的发展和地位的提高最终也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当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相对困难阶段之际，冷战的突然结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此而产生的单极格局对国际体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造成了自由主义价值盛行一时发展中国家无所适从的局面。面对不利的形势，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站在一起的需要不是比过去弱了，这从历届联合国人权会议及其他国际场合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与此同时，中国尽管在政治上因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重新评估中国的地位而遇到一定的困难，但中国已经走过的改革开放道路使中国的国力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推动中国更深深地融入国

际体系，为新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产生质的飞跃做好了准备，也为发展中国家关系迈入新的合作伙伴阶段创造了条件。

#### 四、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新世纪所见证的重大事件加速了国际体系的分化和重组，对中国

的对外战略提出了深刻的命题，其中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虽不居于中心地位，但如何开创新型的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课题已经置于中国对外政策的议程上。党的十六大不但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而且更强调了今后15到20年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前景，也许可得出一些新的视角和观念。

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最大群体，被赋予一些共同的特征，并且基本上是以它们所处的国际体系边缘地位来论证当今体系的不合理性，这当然非常正确。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发展中国家在新时期里已经产生重大的分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证明了发展的理念也许是在不同环境下衍生的，而中国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例证，其他如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也提供了类似的实证案例。其产生的结果并不是如美国学者福山在冷战结束后曾经预见的那样，自由主义从此将一统天下，而是一些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可以提供很不一样的模式，例如英国学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3]以区别于冷战后一度占有绝对话语权的“华盛顿共识”。在这个争论的背后，实际真正隐藏的是国际体系演变也许可能产生新的方向，而不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永久主导。这个议题的尖锐性因“9·11”恐怖袭击而暂时中断，但并没有消失。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迅速崛起可能为改变现行体系的固有运行模式做出贡献，因为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兴起将从实力对比上改变现行体系的政治生态。在力量对比行将改变的进程中，发展中大国将如何处理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将影响到国际体系的演变方向，这个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也是中国思考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指标。对中国的相关政策来说，这是一个从老朋友到新伙伴的战略调整进程。此外，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迅速崛起也在另一个层面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互相之间的关系，因所谓“崛起”主要是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使得发展中大国与主要的原料及能源生产国的关系具有了全新的意义。而对中国来说，更有累积的大量资本向海外进行投资等积极活动，这也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在全方位外交政策的运作下，中国与非洲拉美的重要国家关系都在发生质的变化，双方的需求也早已超越单方面援助的模式，形成了各个层面上的大量互动。这是发达国家表示忧虑不安的一个现象，同时也是检测中国对外战略全面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在新时期主要应在三个层面展开。其一是中国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以与8国集团对话的5国集团为重要标志，成为中国拓展战略空间的重要领域。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体系转变的进程中，已经充分意识到发展中大国在体系内的同一性，同时也通过与发展中大国的关系，进一步塑造中国的身份认同，即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在争取国际关系民主化与更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进程中，中国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致的。其二是中国与亚洲邻国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因其主要也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这个角度审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中国的邻国构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国际环境之一，也是中国在新时期推行双边和多边双管齐下方针的主要地区。当年中国成功参与万隆会议，主要是打开了周边的局面，今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然走向成熟，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建立起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这正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新时期拓展相互关系的写照。在中国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大框架里将得到极大的关注，并将成为衡量中国的国际环境的一个主要因素。其三是中国与传统的非洲拉美国家关系，在这个层面，中国的相关政策在新时期有较大幅度的调整，中国不但要维护与非洲拉美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而且要在新形势下注入新的实质性内容。2006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国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后对非洲国家的政策，这可以被视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因为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与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包含了诸多新的内容，包括中国更深入地参与非洲的经济发展，以及非洲的丰富资源与广大市场为中国提供的机遇。

发展中国家在新兴大国、周边环境和发展资源及市场等方面都构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能否抓住和利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将发展中国家视为中国外交的基础，也就是将中国的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现行国际体系之下，亦可说是同进退共发展的伙伴，这种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将继续保持，并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而在内容上得到不断的充实。

## 注释

[1]“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础”，这个说法最早见之于中国正式文件的应该是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2002年），最新的说法则是2009年7月17-20日举行的第11次驻外使节工作会议，胡锦涛主席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了“巩固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见人民日报2009年7月21日。

[2]Wolf-Phillips:Why “Third World ”?:Origin,Definition and Usage,Third World Quarterly,Vol. 9, No. 4, 1987

该学者认为“第三世界”概念来自于法国社会学家对法国大革命前所谓“第三等级”的描述，后被国际政治学者用来指称战后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意指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因而是先有了“第三世界”，才将西

方发达国家划为“第一世界”，苏联集团被归入“第二世界”，使得这种划分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3]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http://www. fpc. org. uk

打印 收藏



首页	新闻动态	区域研究	研究专题	研究生教育
关于我们	最新动态	中国	政治与安全	招生工作
新闻动态	团队出访	北美	经济	教育管理
会议活动	外宾来访	拉美及加勒比	能源与环境	学生活动
区域研究		东北亚	文化与教育	
研究专题	专家团队	东南亚	全球治理	
专家团队	研究所	太平洋岛屿	战略理论	
研究成果	研究中心	南亚	研究成果	
国际展望	专家名录	中东	论文	
研究生教育		俄罗斯及中亚	时评	
视频		非洲	专著	
		欧洲	研究报告	

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本网站版权属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引用本网站内容请注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址。

Copyright 2009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沪ICP备09044191号-1

[加入我们](#) [联系我们](#) [友情链接](#) [报考研究生](#)